

文学革命的开端

1919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开端。

1919年1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它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从1919年起，文学革命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文学革命，主要包括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提倡文学革命的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政治上封建复古逆流的泛滥，腐朽反动的封建旧文学也充斥和把持着文学界，报刊杂志、教科书，乃至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都用文言文。这些都严重地影响腐蚀着人们的思想，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严重障碍。有鉴于此，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决定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

1919年1月《新青年》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章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从而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不久，陈独秀又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他主张“把革新文学和革新政治联系起来”，使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来一次彻底的革新。在这篇文章里，作为文学革命健将的陈独秀，重点对文学革命内容和重要性作了明确的答复。他认为，中国国民“畏革命如蛇蝎”，导致政治革命不彻底。“今欲革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精神之文学”。他大声疾呼，“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至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还逐一解剖了“贵族”、“古典”、“山林”文学的种种弊端，提出向欧洲学习灿烂的革命文学。他提倡文学界的豪杰人士，向历代迂腐宣战，使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在文学革命中，旗手鲁迅真正把文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很好结合起来。1918年缘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鲁迅无情地鞭挞封建旧道德，揭露中国几千年来用“仁义道德”掩盖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只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此外，鲁迅还发表了白话小说《孔乙己》、《药》以及其他杂文。他的创作实践，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斗争”的作用，为新文学树立光辉典范，表明新文学革命运动已取得一定的发展。

五四运动前，文学革命在文学形式上主要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新青年》既是这一运动的首倡者，同时也是最早实践者，首先它自己全部改为白话文。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一些进步刊物也纷纷改用白话文，后来短评、通讯、社论也都采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所有这些文学改革，使全国文学界的面貌为之一新。

五四运动后，文学革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

鲁迅年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结成新文学统一战线，他们利用《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少年中国》等刊物为阵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旧文学和文言文进行了更加猛烈的抨击，提倡白话，创作新诗，改革旧剧，并不断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抵制和批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革命的发展壮大了新文学队伍，推动了新文学的创作，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新文学作品，标志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圆摇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员源年 员月 源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员愿—员源年），浙江绍兴人。员源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旋补编修。青年时代，他深受改良主义影响，主张教育救国。辛丑后，他倾向革命。员源至员源年，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从事革命宣传和爱国活动。员源年，与章炳麟等在上海创光复会，并被推为首任会长。一年后，中国同盟会成立于东京，蔡元培被本部推为上海分部创办人。员源年，一度在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员源年至员源年，游学德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临时政府移北京后仍继任一段时间（范源濂为教育次长）。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曾仿照西方对旧的教育制度作了若干改革。不久辞职，再度赴德国。宋教仁被刺杀后，他一度归国。员源年秋，赴法。员源年，曾参与办理留法勤工俭学会及组织华法教育会。员源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为大总统，范源濂任教育总长。同年底，蔡元培被电促回国。员源年 员月，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

第一，提倡学术研究。

员源年以前的北京大学，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场所。由

于开办时收的学生是“京官”，所以学生一向都被称为“老爷”。有人回忆说，当时上体育课，教师发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而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对教员的评价，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因为老师有地位，学生毕业后才有靠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预科毕业后，愿入法科，而不愿入文科。教员在这里也多是敷衍塞责，上课时照读一遍第一次的讲义，不管学生听与不听；考试时把题目和范围告诉学生，以避免学生的怀恨和顾全自己的体面。教员中很少有研究学问的习惯。

蔡元培到校后，针对这些陋习加以改革。他的就任演说，便对学生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释“抱定宗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请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明，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第二，展开百家争鸣。

为了造成学术氛围，必须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家，他对教员的选择，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新青年》的编者，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均被请来任教。同时，“拖长辩而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刘师培，也被请来任教；蔡元培虽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戒嫖、戒赌、戒娶妾，但教员中如有违反这些戒条的，也不过苟责备。因为他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殆难成立。”

对于各种学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取。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第三，对学生的政治活动，不予严格干涉。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虽不很赞成，但也不采取严格的干涉，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他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第四，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

当时北京大学各科都聘有外国教员，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经过试用之后，发现学问并不都是很好，而且有的外国教员消极怠工。因此，蔡元培就按合同将这样的人辞退。有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声言，要控告蔡元培。一个被辞退的英国教员竟上朱尔典（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去要其和蔡元培谈判。朱尔典摆出太上皇的姿态，放出口气说：“蔡元培是不想当校长了。”对于这些，蔡元培都置之不理。

蔡元培为了贯彻他的教育方针，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北大的故事

北大的改革，特别是文科的改革，为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制高点，使《新青年》团聚了更多的新文化人，使学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同时，古老的北京，又是新旧思潮交锋的最前线。因此，这一改革，在五四运动史上是有意义的。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尽管在主观上还反映了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大成为运动的中心，并非偶然。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猿瑶米塔瓦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北方面军第 愿集团军于 愿苑年 员月 缘日至 员日在米塔瓦地域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被称为“米塔瓦战役”。

本次战役是根据协约国 愿苑年总战略计划实施的。按计划要求各盟国掌握行动主动权。战役企图规定，在蒂鲁尔沼泽、奥莱地段突破德军第 愿集团军阵地，前出到阿河、埃考河，并夺占米塔瓦和米塔瓦—克罗伊茨堡铁路线。第 愿集团军为实施战役拨出 苑个营，猿门火炮，编为三个战役集群：巴比特集群、奥丁集群，奥莱集群。巴比特集群实施主要突击。德军第 愿集团军在第 愿集团军进攻地段上共有 愿个营。米塔瓦战役计划指望达成突击的突然性。为此，造成一种将西伯利亚第 远军调往罗马尼亚的假相，严格限制知晓战役企图的人员。愿苑年 员月 缘日拂晓，巴比特集群未经炮火准备即对敌人发起冲击，他们在三处突破德军第 愿集团军防御后，占领了斯库德尔、格拉贝东北、欺坎格尔地域。其他集群地段上的冲击未获成功。奥丁集群的部队在短促的炮火准备之后发起冲击并切入了敌防御，但又被迫退回出发阵地。该集群中倾向革命的西伯利亚第 圆军西伯利亚第 苑团士兵拒绝进攻。西伯利亚第 圆 远军的其他部队先后响应。集团军首长残酷地镇压了广大士兵的反战行动。反战领导人被送交战地军事法庭并被处

1917年的故事

决，数百名士兵被流放服苦役。镇压之后，第 10 集团军从 1 月 20 日起继续进攻，但仅形成一些局部战斗。1 月 25 日日终前，战役暂停。主要原因是集团军和方面军首长的领导不力和对将战斗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的措施考虑不周。北方面军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关于派来援军的坚决请求均遭大本营拒绝。士兵厌战也有影响。在七昼夜战斗中，第 10 集团军总共推进 100 公里。米塔瓦战役暴露了俄国广大士兵反战情绪的高涨。米塔瓦战役的战役经验即同时运用两种冲击方法以及米塔瓦战役中的战役伪装经验，被广泛采用于其他战线 1917 年至 1918 年各次战局中。

源瑶杨增新电请阻止俄官员越境捕人

新疆地区此时期多次发生俄哈交涉事件，几经磋商交涉才避免发生事端。员恩年 员月 怨日，新疆省长杨增新自迪化发来电文，说俄国军官又有越境捕人的事，电文说：

“员月 苑日，据温宿县知事杨继昌电称：俄国兵官皮其考甫来温查拿俄犯，请知事协助，并据俄官开来名单，史三木一等 员名等情。查检由俄国逃来哈尔滨市鲁特人民，其每一头目所管，其部下多则数千人，少亦数百人。今俄兵官越境拿办头目，难保该俄民与俄官反抗，中国何能负保护之责。况大头目被拿，则小头目不敢归国。此项俄民归回，更属无期。又何况今日既开单拿人，明日开单拿人，捕拿无了时，且久必生枝节。倘该民被拿情急，四处逃窜，扰害中国治安，即妨害俄国商务，于两国均无好处。查该俄民以游牧为主，逃入深山大泽，雪深数尺，人马难到。该俄民于冰天雪地之中，畏罪逃奔，死亡必多。前乌什由内俄兵未来时，已剐死俄民一千数百人，尸马满山。俄为文明大国，素重人道主义，何忍出此。应以由部与俄使交涉，并电由刘公使与俄政府交涉，将逃来中国俄民，免其辨罪。如果情无可原，俟收回俄国之时再行惩办，以重人道，而顾邦交。”

缘刘永福逝世

刘永福年 员月 怨日，抗法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逝世。

刘永福，广西博白人。曾参加太平军，在广西作战，累功升至左翼大帅。太平天国失败后，率部入越南，驻军在六安、张黑旗，平白苗，越王授于他七品千户职。刘永福年，法军攻越，攻陷河内。越王命刘永福出师，斩法将安邺，法军退守河内，数月不出。刘永福年 源月，再与法军战斗，又斩其将李威台，攻克河内。刘永福年，法又攻越南谅山，并发舰骚扰中国的闽海及台湾。在三圻刘永福出击法军，斩 猿 肆 肆 人，又战于临洮，法军连夜逃走。刘永福年，清将冯子材也在镇南关大破法军，攻克谅山。这时中法议和，刘永福归国。刘永福年，清廷对日宣战，命刘永福自南澳率部屯台湾，驻台南。刘永福年 猿月，清兵失败，割让台湾。台人谋划独立，问刘永福。刘永福说，吾愿与台湾共存亡。远月，台北陷。台南人奉总统印交给刘永福。刘永福说：今日事在兵足食足，不在总统之印也。推却不受，于是恢复全台团练总局，策划战守。苑月，日本台督桦山资纪知台南不易攻，致书劝说刘永福投降。刘永福复书坚决拒绝之。于是桦山攻打台南。刘永福率军迎战，士卒伤亡惨重，援兵又绝。怨月，刘永福得英人帮助，渡海归粤。辛亥广东光复，胡汉民为都督，请刘永福出任全粤民团总长。刘永福年，日人提出《二十一条》，刘永福电陈袁世凯，请死与日抗。刘永福年 员月 怨日，刘永福病逝。

透摇西原借款

1915年 远月袁世凯死后，日本帝国主义即认为段祺瑞是唯一能接替袁世凯事业的实力人物，便以金钱、武器支持段扩充皖系军阀势力，以段为自己在华的代理人，谋求更大的权益。

段祺瑞继袁世凯把持北京政府后，为了建立军事独裁统治，实现其“武力统一”的野心，对外积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早在 1915年 12月，段祺瑞就主张“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何者中国自办，何者中日合办，何者让日本人办。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支支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同年 12月，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派西原龟三来华活动，在与曹汝霖、陆宗輿的密谈中，商谈了所谓“中日密切合作”问题。

段祺瑞极力求得日本支持，日本则选中段祺瑞为侵略中国的工具。这样，两者一拍即和，互相勾结起来。不过，日本的侵华策略却有所变化。日本大隈内阁曾以强硬态度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企图一举鲸吞中国，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继任内阁首相寺内正毅鉴于前任之失败，乃以大量借款代替强硬交涉，既可缓和中国人民的激忿不满，又收加紧控制、掠夺中国之效。同时，此时中国对欧战尚取中立立场，日本深恐中国加入德、奥一方，于协约国不利，于是，也企图乘借款

之机促动中国对德、奥宣战。另外，日本的经济状况，因欧战关系增加了商品输出，有了过剩的资本，为向中国输出资本提供了可能条件。因此，日本便采取了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入中国，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以掠夺中国种种特权，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为了向中国输出资本，1914年10月，日本的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组成特殊银行团，专事对华投资。1914年11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作为卖国借款的经手机关。日本三家银行所组成的特殊银行团，只是名义上的承借银行，实际上，所借款项均由日本政府从国库预备金中支出。同时，所借款项不以日本政府名义出面，而是由以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身份的西原龟三出面联络。对华借款由特殊银行团承借并由西原龟三出面，这是日本政府煞费苦心的特殊安排，以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注意和干涉，实现其单独对华借款。

1914年11月至1915年11月，段祺瑞政府向日本借款八次，总计为1.25亿日元，系由西原龟三从中奔走促成，故称西原借款。

西原龟三是日本侵略分子，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时就跟随左右，帮助策划，深受寺内信任。1914年10月寺内继大隈组阁后，西原虽未在内阁任职，但仍在幕后为寺内献计策划，多被采纳接受。寺内决定改变侵华策略后，便派西原全权奔走联系，经办对华借款事宜。

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为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等。

西原借款各项名目、时间、金额、条件如下：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袁援交通银行借款，袁~~1917~~年 袁月 袁~~10~~日签订，缘~~1000~~万日元，以陇海铁路债券、中国政府国库券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为担保。

袁援交通银行借款，袁~~1917~~年 怨月 袁~~10~~日签订，圆~~1000~~万日元，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为担保。

猿援有线电报借款，袁~~1918~~年 源月 猿~~10~~日签订，圆~~1000~~万日元，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的一切财产和收入为担保。

源援吉会铁路筹备借款，袁~~1918~~年 远月 袁~~10~~日签订，袁~~1000~~万日元，担保：以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缘援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袁~~1918~~年 愿月 圆日签订，猿~~1000~~万日元，以吉黑两省之金矿、国有森林以及上两项所生属于政府之收入为担保。

远援满蒙四铁路筹备借款，袁~~1918~~年 怨月 袁~~10~~日签订，圆~~1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苑援高徐、济顺铁路筹备借款，袁~~1918~~年 怨月 袁~~10~~日签订，圆~~1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

愿援参战借款，袁~~1918~~年 怨月 袁~~10~~日签订，圆~~1000~~万日元，担保：以中国政府国库券按贴现方式办理，到期后以同一条件换发新券抵换。

上述八项借款总计 袁~~10000~~万日元。

西原借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属经济借款。但实际上并未用于该项名目，而是 怨~~000~~以上都用于政府的军政开支和偿还内外债本利。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承认，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 圆~~1000~~万元，而财政部可靠收入每月不足 袁~~1000~~万元，所缺 愿~~000~~元则依靠借款弥补。章宗祥也供认，借款常被政府挪用，由于军费所需，所借款项就无形地消失

愿年 的故事

二十
世纪
百年
故事

了。段祺瑞政府利用日本的支持，维持独裁统治，进行“武力统一”，如同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所说：“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政局虽有变更，然“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不惜大量出卖国家民族主权，而日本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加紧对中国的控制。

愿年 愿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愿月，日本对德宣战，派兵侵入中国山东，至 愿月，夺得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全部权益。愿年 愿月 愿日，段祺瑞政府按照日本的意图对德、奥宣战后，不仅没有向日本提出归还山东权益的要求，反而在西原借款中进一步出卖了山东的权益。愿年 愿月 愿日，即中日签订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的前四天，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照会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要求中国同意日本驻兵济南、青岛，同意在经营和管理胶济铁路方面日本享有种种特权。实际上是以此作为高徐、济顺铁路借款的条件。段祺瑞政府为了取得借款，竟接受了日本的要求。同日，章宗祥在致后藤的复照中，把后藤照会所提要求一字不漏地照抄之后，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上列之提议，欣然同意。”后来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便以此为借口，拒不退还山东。

在西原借款中，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所谓满蒙四路和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以及全国的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日本，使日本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权益并控制了中国的电信事业。

日本又在参战借款的名义下，派大批顾问钻进段祺瑞政府，派出军官为段祺瑞训练军队，取得了段祺瑞编练的所谓

二十世纪百年故事

“参战军”的指挥权。

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在 1919 年 12 月 15 日下台后供认：“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事实证明，日本政府从段祺瑞手中获取的实际权益比从袁世凯那里得到的要多得多；袁世凯政府和段祺瑞政府都是卖国政权，而后者出卖主权与前者相比，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1937年日本“特别银行团”组建

1937年11月10日，日本组成了所谓“特别银行团”，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控制。

1937年12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因在《二十一条》要求交涉之后，复演“郑家屯事件”等等丑剧，终于以对华失策而倒台。继之而起的是寺内正毅内阁。寺内正毅内阁成立之后，鉴于过去大隈内阁时期采取那种公开压迫和武力威胁的侵华手段，招致了中国人民的愤怒抗议，从而激起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因而决定改变对华策略，实行以经济侵略为主的所谓亲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北京政府提供大量借款的办法，为日本侵华创造有利条件，从而在中国攫取利权，达到进一步奴役中国的目的。

促成日本对华策略的改变，除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外，日本自身的条件和特殊的国际环境，也是促使它改取这种新策略的重要因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他顾，使日本夺取了它们在远东的大部分市场，从而给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机会。1913年到1937年间，日本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几乎四倍；在国际收支上，出超140亿日元，超出它的全部对外债务100亿日元。日本从债务国一变而为债权国。为了给这批大量“过剩”资金寻找出路，亟谋向海外进